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和社交焦虑—基于认知-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

作者：王明忠 范翠英 周宗奎 陈武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文章 1.2 部分第 2 自然段中写道：“以上三方面构成……从而提高他们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这一部分主要阐述的是情绪不安全感三个方面的积极功能，似乎和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密切，而且后续的分析中也没有体现出这三个方面对个体发展具有保护作用，所以是否可以删除。

回应：

诚如专家所指出，1.2 部分第 2 自然段中的“以上三方面构成……从而提高他们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这一部分与全文的主题关系不密切，因此已经从文中删除。

意见 2：

2.1 被试部分“被试的年级和性别分布无显著差异 ($\chi^2(1)=1.80, p=0.198$)。”似乎考察的是年级与性别的分布是否有显著关联，没有体现出性别的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年级的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

回应：

如您指出，2.1 部分“被试的年级和性别分布无显著差异 ($\chi^2(1)=1.80, p=0.198$)。”这句话存在表述失误，已经改为“被试的年级和性别分布无显著关联 ($\chi^2(1)=1.80, p=0.198$)”，文中用绿色标出。

意见 3：

“Cronbach's α ”的写法不规范，应该为 Cronbach 系数 α 为……。

回应：

谢谢专家细心指出，已经把 2.2 研究工具部分中的四处“Cronbach's α ”改为“Cronbach 系数 α ”，并用绿色标出。

意见 4：

抑郁体验问卷只选择了前两个维度，但原因或依据是什么，作者没有提及。

回应：

抑郁体验问卷 (Depressiv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DEQ) 的原始问卷由 Blatt, D'Afflitti 和 Quinlan (1976) 基于抑郁类型的理论构想而编制。Blatt 把抑郁分为情感依附性抑郁 (anaclitic depression) 和内射型抑郁 (introjective depression)，前者以无助感、脆弱感、担心被抛弃、渴望爱与保护为主要特征，后者则以自卑感、羞愧感、无价值感、无望感为主要特征。本研究选择的前两个因子的内涵对应 Blatt (1976) 提出的两种抑郁类

型：人际依赖因子反映情感依附型抑郁者（*anaclitic depression*）的特点，即害怕被遗弃和过度依赖他人；而自我批评因子则体现内射型抑郁者（*introjective depression*）的特点，即对自己严格要求，常有无价值感和自罪感，丧失自尊心。可能由于第三个因子（即“有效性”）的内涵不能很好地对应两种基本抑郁类型，以往不少研究者仅仅采用 DEQ 的前两个维度考察抑郁与其它变量的关系，比如，Mongrain（1993）在考察大五人格因素与抑郁的关系时只选择 DEQ 的前两个维度。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只选用 DEQ 的前两个维度。相应地，我们在正文 2.2 研究工具中的抑郁体验问卷部分用绿色标出采用前两个维度的原因，并在参考文献部分补充 Mongrain（1993）的文献。

意见 5：

新建构的综合模型中，是否可以增加认知评估直接作用于抑郁和社交焦虑的路径？因为抑郁和焦虑本身也是一种情绪问题。

回应：

专家建议的理论模型我们考虑过，但为在综合模型中重点突出认知评估对情绪不安感的影响以及情绪不安全感在认知评估和情绪适应变量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并考虑到前面的理论假设，所以在综合模型中没有设定由认知评估到社交焦虑和抑郁的直接路径。

我们认真检验专家提出的模型，发现认知评估到社交焦虑和抑郁的直接路径的效应分别为 0.04 和 0.05，并不显著，而删除两条直接路径后的模型（即当前的综合模型）的拟合度并没有显著变化（NNFI 等指标前后基本没有变化，均在 0.95 以上；RMSEA 变化 0.001； χ^2/df 的值前后均小于 5）。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直接检验当前的综合模型。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的文献：

Blatt, S. J., D'Afflitti, Quinlan, D. M. (1976). Experiences of depression in normal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85(4), 383–389.

Mongrain, M. (1993). Dependency and self-criticism located within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4), 455–462.

意见 6：

其他一些语言或者标点符号的问题见文中绿色标注部分。

回应：

已经对专家仔细点出的语言和标点问题作出仔细修改。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1.1 第一段“评估过程受到父母冲突特点（频率、强度、解决情况等）以及情境因素（性别、气质和情绪氛围）的影响”，性别与气质怎么会是情境因素？

回应：

谢谢专家的意见。我再次仔细阅读 Grych 和 Fincham (1990) 的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一文，发现作者的确把气质和性别归类到影响儿童认知评价的情境因素之中（如下图红色标出部分）。从图中看到，影响认知评估二级加工过程的因素包括父母冲突因素和情境因素两大类，可能原文研究者在考察认知评估的影响因素时，把父母冲突特点作为参照点（而不是以儿童本身为参考点），从而使其它因素均归为父母冲突的情境因素。同时，我们在原文中的叙述可能存在歧义，因此把情境因素中的气质和性别不再呈现在括号内。已经在文中用绿色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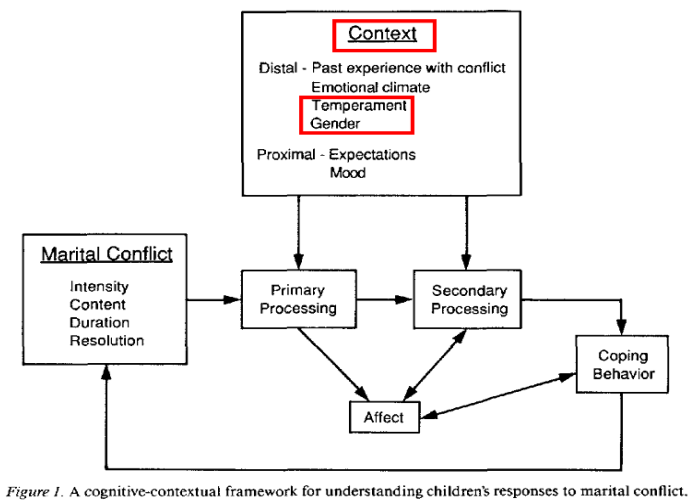


图 1. 来自 Grych 和 Fincham (1990).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的文献: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267–290.

意见 2:

一个相关研究有 9 个假设之多，应该简化。

回应:

谢谢专家的意见。由于本研究同时检验认知情境理论和情绪安全感理论，所以提出假设较多。经过仔细思考，梳理几个假设与模型建构的关系，发现假设 9 的内容涵盖假设 7 和 8，所以把假设 7-9 合并，由此简化到 7 个假设。相应地，文中表述作了调整，已用绿色标出。

意见 3:

父母冲突量表，作者介绍时说“以往研究者（Grych, et al., 2000）一般把前三个因子（即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不解决）作为父母冲突特征量表（Conflict Properties Scale），测量儿童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把威胁知觉和自责作为一个分量表（Threat and Self-Blame scale），测量儿童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估，”，如果前三个因素代表了父母冲突，后两个因素代表的是认知评估，则这五个因素是不能放在一起做因素分析的。特别是作者的研究假设是用前者预测后者。与你不能用大五人格的前三个因素预测后两个因素是一个道理。

回应:

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构建理论模型后，为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一般根据该理论模型编制测量工具，然后用该测量工具验证理论构念的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下面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

- (1) Grych 和 Fincham (1990) 的认知情境理论论述父母冲突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比如父母冲突自身的特点(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和解决方式)对儿童的认知评估(威胁性评价和自责)的影响。根据该理论编制 CPIC 量表后，研究者对理论构念中的不同成分进行了检验。Grych, Fincham, Jouriles 和 McDonald (2000)在检验认知评估在父母冲突与儿童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时，便把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不解三因子作为父母冲突特征量表 (Conflict Properties Scale)，测量儿童感知的父母冲突水平，而把威胁知觉和自责两因子作为一个分量表 (Threat and Self-Blame scale)，测量儿童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估。对此，Grych 等 (2000) 解释，尽管这两个分量表均来自 CPIC 总量表，但有很大区别：冲突特征分量表的项目主要从行为层面反映父母冲突的互动水平，而威胁知觉与自责分量表的项目主要反映儿童对父母冲突的主观解释和反应。
- (2) Caplan (2010) 关于一般问题性网络使用 (generalize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GPIU) 的理论模型阐述了五个导致个体问题性网络使用的构念：在线社交偏好、心境调节、认知性沉迷 (cognitive preoccupation)、冲动性网络使用和消极后果。Caplan (2010) 根据其理论构想编制 GPIU 的测量工具，并测量不同成分之间的预测关系 (如图 2 所示)。图 2 来自 Caplan(2010)的研究，其中的 POSI 表示在线社交偏好，而自我调节不足 (deficient self regulation) 则是以认知沉迷和冲动性网络使用两个因子的均值为指标构建的潜变量，该模型中的变量均来自 GPIU 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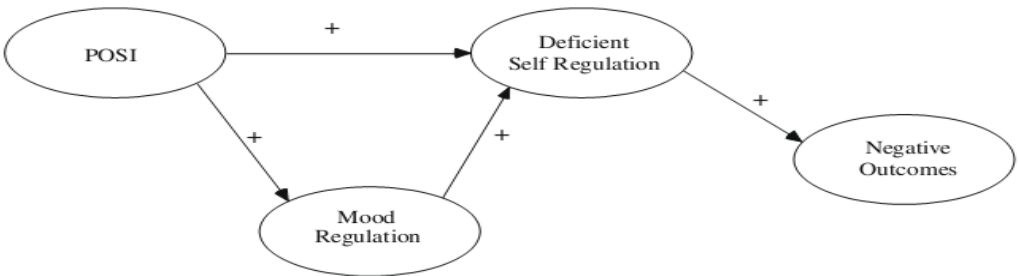


Fig. 1. Hypothesized model of GPIU.

图2. 来自Caplan (2010)

从以往研究者的做法可以看出，他们针对包含较多构念的理论框架编制测量工具，测量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论证理论的合理性。但是，有些构念虽属于同一框架之下，但内涵差异很大，无法计算关联性，一般不能分析变量间的预测关系，正如审稿专家提出的“大五”人格量表，虽然包含五个维度，但不能构建不同维度之间的预测关系。

基于以往研究者的做法，本研究使用该量表中的一个构念去预测另一个构念。不过，这种情况在研究者根据较大的理论框架编制工具时比较适用，因为每个构念往往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由多个因素构成。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的文献：

Caplan, S. E. (2010).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generalize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 two-step

approach.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1089-1097.

Grych, J. H., & Fincham, F. D. (1990).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 267-290.

Grych, J. H., Fincham, F. D., Jouriles, E. N., & McDonald, R. (2000).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Testing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appraisals in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6), 1648-1661.

Grych, J. H., Seid, M., Fincham, F. D. (1992). Assessing marital conflict from the child's perspective: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hild Development*, 63, 558-572.

意见 4:

表 1 是描述统计分析,把父母认知冲突、消极认知评估和情绪不安感以及抑郁都当成单一因素了,无论是从问卷结构的介绍,还是后面模型的检验都表明这些问卷是多维的,因此是不能相加得总分的。就好象不能把大五人格 5 个因素加起来得到一个人格总分是一个道理。

回应:

诚如专家所指,父母冲突水平、认知评估和情绪不安感都是多维的,本研究没有把它们看作单一因素,我们在建构模型 M1、M2 和综合模型 M3 时,均把这些变量作为潜变量,然后用多个指标反映这些潜变量。比如,父母冲突水平有三个指标,即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不解决,并没有把三个因子的所有项目放一起计算均值,然后进行简单的路径分析。在计算相关数据时,也是通过 lisrel 输出结果获得潜变量的相关矩阵,而不是计算项目均值后再算相关。

原稿的 3.2 部分第一段已经说明潜变量的指标由同一个因子的项目计算均值获得。这种指标打包的方式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共同度,减少随机误差(吴艳,温忠麟,2011)。以父母冲突水平潜变量为例进行说明: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和冲突不解三个因子均含有 6-7 个项目,这三个因子构成的父母冲突水平潜变量就有 19 个项目;如专家所言,这 19 个项目属于不同维度,所以不能简单相加计算总分,而直接把 19 个项目作为冲突水平的指标也不合适。在回答您的第 3 个问题时所举的第二个例子中,研究者使用认知沉迷和冲动性网络使用两个因子的均值作为潜变量自我调节不足的两个指标。因此,本研究仿照前人做法,用因子的均值作为潜变量的指标。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并补充到文中的文献:

Wu, Y., & Wen, Z. (2011).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859-1867.

[吴艳,温忠麟.(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补充同源方差分析结果.

回应:

原文中以“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为标题的部分补充同源方差分析的结果,并补充相应文献,因此原来的 3.2 部分变为 3.3 部分,其它标题顺序依次调整。文中补充的同源方差分析内容如下: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1)把五个潜变量的指标作为单因子模型的新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Harris, & Mossholder, 1996),检验结果表明,单因子模型拟合度很差($\chi^2/df=60.21$, NNFI=0.31, CFI=0.45, GFI=0.53, RMSEA=0.35)。(2)对本研究五个潜变量及其指标构成的五因子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拟合较好($\chi^2=59.23$, $df=26$, CFI=0.99, GFI=0.98, RMSEA=0.05)。接着,采用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周浩,龙立荣,2004;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检验加入方法因子后的六因子模型,拟合指标良好($\chi^2=29.71$, $df=17$, GFI=0.99, CFI=0.99, RMSEA=0.04)。五因子和六因子模型的比较结果表明,模型的卡方量发生显著变化($\Delta df=9$, $\Delta \chi^2=29.52$, $p<0.01$)。但 $\Delta \chi^2$ 会受到样本大小的系统影响,因此模型比较仍需参考其它拟合指标的变化(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可以看到,CFI, GFI 和 RMSEA 前后改善程度均不超过 0.01,这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谢宝国,龙立荣,2008;李锐,凌文铨,柳士顺,2012)。综合以上两种分析方法的结果可以判定,同源方差问题没有对本研究造成严重影响。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并加入原文的文献:

Harris, S. G., Mossholder, K. W. (1996). The affective implications of perceived congruence with culture dimensions during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22(4), 527-547

Li, R., Ling, W., & Liu, S. (2012).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or the organiza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situation interaction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9), 1202-1216.

[李锐, 凌文铨, 柳士顺. (2012). 组织心理所有权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人-境互动”的视角. *心理学报*, 44(9), 1202-1216.]

Wen, Z. L., Hau, K. T., & Marsh, H. W.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ing: Cutoff criteria for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and chi square tes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 186-194.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36, 186-194.]

Wu, Y., & Wen, Z. (2011).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859-1867.

[吴艳, 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Xie, B. G., & Long, L. R. (2008). The effects of career plateau on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0, 927–938.

[谢宝国, 龙立荣. (2008). 职业生涯高原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离职意愿的影响. *心理学报*, 40, 927–938.]

Xiong, H., Zhang, J., Ye, B., Zheng, X., Sun, P. (2012). Common method variance effects and the models of statistical approaches for controlling it.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5), 757-769.

[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5), 757-769.]

Zhou, H., & Long, L. (2004).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942–950.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意见 2:

模型分析是否可以采用 parceling 技术进一步分析。

回应:

谢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当潜变量包含较多项目时，不宜用项目作为指标直接构建潜变量模型（吴艳，温忠麟，2011）。本研究中，我们已经采用打包技术对项目进行整合，每个潜变量均用不同因子的项目均值作为新指标。比如，父母冲突水平潜变量包括冲突强度、冲突频率和冲突不解决三个因子，每个因子有 6-7 个项目，共 19 个项目，对每个因子求取项目均值，然后用项目均值作为该潜变量的三个新指标。这种项目打包的策略是可行的，有利于提高共同度，减少随机误差（吴艳，温忠麟，2011）；国外研究者较多采用该方法处理项目较多的模型建模问题，比如，Caplan（2010）在考察在线社交偏好（online social preference）对心境调节(mood regulation)、认知着迷(cognitive preoccupation)和冲动性网络使用(impulsive internet usage)的影响时，便把后两个因子分别求取均值，作为调节不足 (deficient regulation) 的两个指标。

虽然我们在研究中已经采用该技术，但没有在行文中提到，因此在文中补充相应说明和参考文献，并用绿色标出。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的文献:

Caplan, S. E. (2010).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generalized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 A two-step approach.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6, 1089-1097.

回答该问题参考并加入原文的文献:

Wu, Y., & Wen, Z. (2011).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859–1867.

[吴艳, 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意见 3:

进行可能性推论，文内似乎更多强调因果推论。

回应:

已经再次细心阅读原文，对因果性推论过强的语句进行调整，在讨论部分对研究结果做更多可能性分析，比如，使用“可能”、“往往”、“一般”、“易于”或“倾向于”等表达方式

弱化因果推理的语气。通过仔细阅读全文，对文中其它部分的表达欠妥的词句作了调整和完善。已经用绿色标出修改修改之处。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认知情境论中的“情境”一词与“情景”混用，需统一。

回应：

感谢专家的细致意见。已经把行文中的“情景”统一为“情境”。

意见 2：

英文摘要仍存在问题，具体见文章标红处。

回应：

已经仔细思考专家在英文摘要中标出的部分，并进行修改。专家用红色标出“Domestic researchers have tested the former theory, the latter theory has rarely been tested.”一句。我们原本想表达，国内研究对认知-情境理论作了检验，而几乎没有研究探索情绪安全感理论的意义；实际上，国外研究关于情绪安全感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较少。但是，毕竟不能把国内是否缺乏某类研究作为进行此类研究的出发点，因此，英文表达的确存在不当之处，给人造成在做重复研究的印象，已经改为“The cognitive-contextual theory has been validated by much empirical research while the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relatively lacks empirical evidence.”。其它几个词汇由于粗心，造成句子时态不当，已经改正并用蓝色标出。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作者根据审稿意见进行了认真回复和修改。我本人通读后，有以下建议：本研究中儿童知觉到的父母冲突多为外部冲突，由此产生的儿童适应问题应当不仅是内化的情绪问题，也包括外部行为问题。作者为何仅关注内化情绪问题？（是否父母冲突引起的内部情绪问题多于或严重于外部行为问题？亦或其他？）建议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有关父母冲突引起儿童适应问题之外部行为问题的文献予以简介或简评，使本研究的问题提出依据更为充分。另外，讨论中是否也可增加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是否有可能外推解释或预测儿童外部行为问题。

建议修后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所提意见。诚如专家指出，父母冲突不仅与儿童的内化情绪问题有关，而且与其外化行为问题有关。以往研究发现，认知评估主要在父母冲突与儿童的内化问题

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在父母冲突与其外化问题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Frank,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相比认知-情境理论，情绪安全感理论的解释范围较为广泛，分析了情绪不安全感在父母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以及外化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考虑到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我们只选择了青少年的两个典型内化问题（即抑郁和社交焦虑）作为结果变量，探讨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内部过程。

根据专家建议，对两处进行了修改：

（1）为使问题提出部分的陈述更为合理，我对问题提出部分的第一段作了调整，内容如下：

由于抑郁和社交焦虑是父母冲突导致的青少年的两个典型内化问题（Grych,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 Grych & Fincham, 2001），因此本研究在验证理论的基础上尝试整合这两个理论，以更完善地解释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内在过程。

（2）在讨论部分增加“4.4 研究展望与实践意义”部分，补充说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是否有可能外推解释或预测儿童外部行为问题，以及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所具有的实践意义。补充内容如下：

4.4 研究展望与实践意义

虽然认知-情境理论更适于分析父母冲突如何通过儿童的认知评估过程影响其内化问题（Frank,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 杨阿丽, 方晓义, 涂翠平, 李红菊, 2007），但也有研究发现，自责作为重要的认知评估因素，在父母冲突与儿童的外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Davies, Harold,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2）。相比认知-情境理论，情绪安全感理论的解释范围较为广泛，适于探讨情绪不安感在父母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以及外化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考察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特别是综合模型 M_3 ，是否适于解释父母冲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之间的内部过程。此外，为拓宽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解释范围，未来研究有必要采取纵向设计，在不同时段收集父母冲突、认知评估、情绪安全感以及适应问题的数据，以便考察父母冲突对其它变量的纵向影响。

本研究结果为家长理解父母冲突对青少年成长的消极意义，以及为青少年合理应对父母冲突提供了重要启发：第一，父母应有意识地避免或减少冲突，特别是在孩子面前。父母冲突一旦被孩子知觉，父母应以合理方式解决冲突，使其学习合理的冲突解决策略。第二，孩子经历父母冲突之后，父母要引导孩子对冲突原因进行合理归因，以免孩子把冲突原因归于自己而产生威胁感，或产生自责。第三，孩子经历父母冲突之后，父母应对孩子进行情绪抚慰，甚至向孩子道歉。这有助于降低孩子的情绪不安全感，以免造成情绪失调。第四，教育工作者要指导青少年以合理方式应对父母冲突。比如，引导他们不要卷入父母冲突，这样不利于冲突解决，反而会加剧父母冲突，也为后续的父母冲突埋下隐患。

回答该问题时参考并加入文中的文献：

Davies, P. T., Harold, G. T., Goeke-Morey, M. C., & Cummings, E. M. (2002). Child emo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 67 (3, Serial No. 270).

Frank, J. H. G., Fincham, F. D., Jouriles, E. N., & McDonald, R. (2000).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justment: Testing the mediational role of appraisals in the cognitive-contextual frame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 1648–1661.